

台灣工業化模式的觀察

● 文崇一

現代化理論與世界體系理論

對於第三世界的工業化問題，曾經有過兩個具有支配性的理論：一個是現代化理論，以為開發中國家只要能夠實行民主政治，配合工業化政策，就可以獲得必要的經濟成長，進而改善人民的生活狀況。後來的結果證明，這是學術界的空想，第三世界的政治現實和文化傳統，根本沒有能力承擔這種改革計劃。另一個是結合依賴理論而來的世界體系理論，認為開發中國家在國際經濟市場下，只能扮演一種邊陲角色，做點小買賣，不可能有多大經濟成長的希望。這樣就使第三世界注定要做國際政治、經濟舞台上的配角，看起來有點可悲，似乎也無可奈何。

事實上，台灣在現代化理論流行以前，就在做一些改革的工作，那是當時的惡劣環境所逼出來的。後來的發展，頗有點符合現代化理論，應該是巧合，而不是決策者依照理論需要去制訂經濟、政治政策。一個明顯的事實是，台灣在專制政治體系下進行經濟改革，即在政治不自由的環境中，允許經濟活動的充分自由，包括政策與市場。當時的言論固極端不自由，但只要不向統治者的權力和合法性挑戰，大致還有批評的空間，這使某些不當政策獲得改善的機會。

台灣模式對第三世界國家的特殊意義

台灣的工業化過程，從早期的紡織品出口，到其他輕工業，到改善交通狀況，到重化工業，到電子工業，這種循序漸進的途徑，跟西歐的工業化模式，若相彷彿。雖然已開發國家因工業化所帶來的後遺症，如環境污染、犯罪率增



圖 台灣在專制政治體系下進行經濟改革，即在政治不自由的環境中，允許經濟活動的充分自由。

加，我們未能預為防患，但經濟成長後的生活方式改變，對社會與政治的開放，的確有它的強大壓力。目前台灣的政治民主化，距離應有的目標，固然還相當遙遠，可是，現有的政黨政治雛形，總是在工業化以後帶來的結果。這一點不僅與現代化理論不甚符合，與世界體系理論也不一致。

也許這就是台灣模式吧。台灣的經濟成長，不只對現代化理論與世界體系理論具有特殊的意義，對第三世界許多國家也有特殊的意義。其中最重要的有兩點：第一是經濟發展可能帶來的政治改革。我們通常把這兩個領域分別討論，似乎沒有甚麼關聯，而台灣的政治開放，至少是經濟成長以後的事，這是事實。第二是所得增加可能使無產階級專政落空。工業化後的社會，中產階級成為主流，有效率的政府，可以用福利政策彌補低收入者的需要，再沒有農業社會那麼多的無產階級。前者是現代化理論的重新解釋，後者則推翻了過時的列寧理論。在世界性經濟成長的號召下，沒有哪個社會甘於貧窮，甘於被專制者統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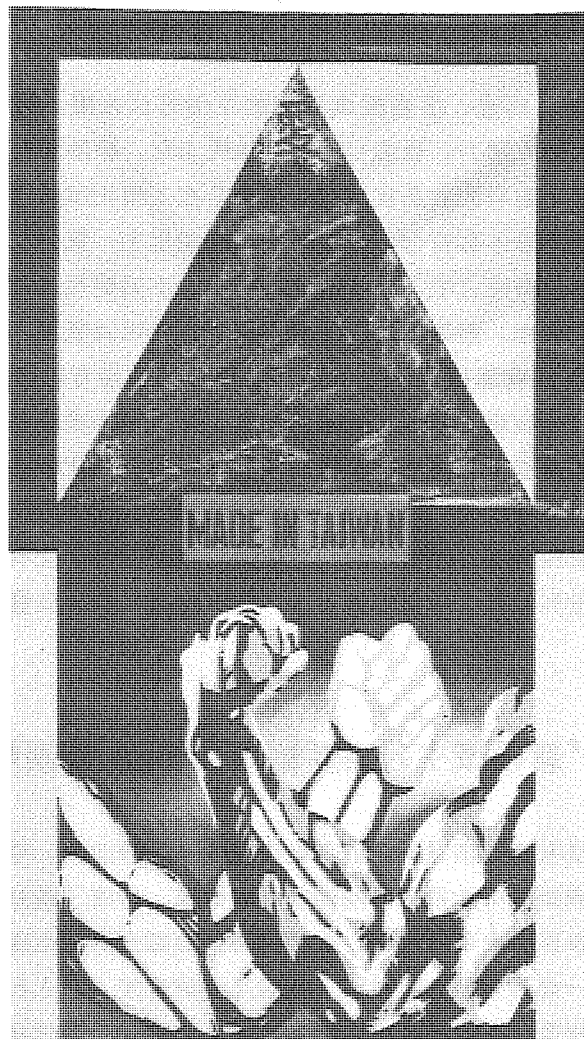
「新權威主義」和「儒家文化論」的誤解

台灣顯然沒有能力領導第三世界從事政治、經濟改革，卻提供了一個發展的模式：從經濟改革可能帶動的政治和社會改革，即有了較好的生活，再去改善政治和社會事務。改革的基礎，在於擁有一個穩定的工作環境，不受國際壓力的干預，有一套具有彈性的政策（特別是經濟政策），人民努力，教育程度不斷提高，有相當高的行政效率，諸如此類。台灣的工業化過程，大概就是這

樣的。如果不是意識形態太強，權力鬥爭過多，台灣的政治、經濟成就當可超過目前的水準。第三世界在參考台灣模式的時候，也必須有全盤的考慮，不能以偏概全。幾年前，大陸看到台灣在專制統治下完成了一些改革的工作，就提出「新權威主義」，這是十足的誤解。

台灣在工業化起步之初，與中國大陸的國民所得差不多，遠落在香港、新加坡、菲律賓之後，那時香港、菲律賓的商品，經由走私，陳列在台北委託行高價出售。可是，經過幾十年的歲月，台灣的確是埋頭苦幹，希望在經濟上突破困境，創造一個新的工業環境，因為台灣的資源有限，在當時的國際情勢中，已經沒有別的選擇了。台灣也可能作另一種錯誤的選擇，例如繼續在大陸時期的腐化與無能，幸好沒有走上這條死路。就在台灣人民努力工業化的時候，大陸關起門來搞意識形態與高階層的權力鬥爭，一鬥幾十年，就這樣被人家遠遠拋在後面了。菲律賓當年的民主和所得，都不是台灣所能企及的，當年台灣人到了菲律賓，多不肯回來，它的工作條件比台灣好得多。可是，由於獨裁統治，無法從事改革，到今天也就不能跟台灣相提並論了。這一事實說明，工業化的成敗，跟工業化制度以及執行制度的能力，有非常大的關係。制度為政策的來源，能力牽涉比較廣泛，與執行者的訓練、性格、行為和整體的文化

圖 經過幾十年的歲月，台灣的確是埋頭苦幹，希望在經濟上突破困境，創造一個新的工業環境。（楊茂林：《MADE IN TAIWAN·標語篇》，1990。）



環境都有關。現在有些學者把東亞的經濟發展歸功於儒家文化，看來必須重新檢討。

我們可以舉幾個例子來說明，菲律賓人住在同樣的地方，過同樣的生活，為甚麼以前的經濟比現在好？顯然是不當的制度所造成的。散居各地的中國人，差別應該不會太大，而中國大陸的經濟與台灣、新加坡、香港、乃至其他海外華人作比較，都有天壤之別，顯然也是制度造成的。這些制度包括廢除私有財產、無產階級專政、以及永無休止的政治運動，這對於國家的經濟成長不只是打擊，根本就是毀滅。在台灣的工業化，雖然也受到政治制度的影響，但終究沒有妨礙經濟的發展。曾經有的研究指出，牙買加人為甚麼一到美國，就有機會發財？因為美國的制度不同於牙買加。

台灣仍有待改進

討論台灣的工業化，似乎不必掉入制度論或文化論的圈子裏，這很容易變成套套邏輯。畢竟一個地區的經濟、政治改革，都有它的特殊環境和歷史傳統。改革的決策，最重要的就是要能把握必須把握的條件，不可用意識形態做為選擇的標準，更不可用主觀的好惡定取捨。台灣也遭遇過許多挫折，有的到現在還沒有解決，有的還在擴大中，最主要的莫過於民意代表與官吏的特權、官商勾結、經濟詐欺之類。這一切都由於錢漸漸多起來，不知如何管理；事務漸漸複雜起來，不知如何用法律規範。我們常常叫理性、法治，但到處都是一言不合就打起來，一不如意就拔槍相向，打人、殺人如兒戲。看來，經濟成長也未必盡如人意，政治和社會秩序的成長，還有所等待。

文崇一 台大歷史系畢業後赴美國哈佛大學研究。曾任中央研究院民族所所長、政治大學民族社會學系主任、台大教授，現任中央研究院民族所研究員。主要著作包括《犧牲的代價》、《西河的社會變遷》（合著），編著有《社會變遷中的青少年問題研討會論文專集》（合編）、《現代化與中國化論集》（合編）。